

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发展中的儒家特色

焦兴青

(拉萨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西藏 拉萨 850003)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迅速壮大发展起来,不但其宗教形式、理论、仪规等得以完善,而且完成了向官方道教的转变。在该时期道教的改革发展过程中,道教的一些代表人物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些道教代表人物在身世背景、学宦经历、入世态度及思想理念等方面,无不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染。这使他们在改革和发展道教的过程中,在各方面都深受儒家的影响,由此也决定了道教在该时期的发展中所带有的鲜明的儒家特色。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 道教 儒家

中图分类号:B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083(2010)04-0079-03

The Confucian Characteristic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aoism in the Wei, Jin, the Southern and the Northern Dynasties

Jiao Xingqing

(Lhasa Normal College, Lhasa, Tibet 850003)

【Abstract】Taoism was rapidly developing in the Wei, Jin,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Not only its religious form, the theory, but also its meter gauge consummated, and it had changed the official Taoism. Some representatives played a key role in the process of Taoism reforming and developing. Their experiences, the backgrounds of study and an official, their manners and thoughts, all these were deeply influenced by Confucianism.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Taoism were inevitably affected by Confucianism in all aspects, which was full of striking Confucian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the Wei, Jin, the Southern and the Northern Dynasties Taoism Confucianism

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在寇谦之等代表人物的推动下不断地官方化,这些代表人物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也致使道教在该时期的发展中具有鲜明的儒家特色。

1 具有儒学背景的众多道教代表人物

考察该时期这些道教代表人物的家世,可以发现他们都是没落的官宦世家子弟。如南朝道教改革

的关键人物陆修静出身世族地主家庭,为东吴丞相陆凯之后。茅山上清派创立者陶弘景出身于世族,幼年就开始读《论语》、《五经》。曾任齐巴陵王、安成王、宜都王等诸王侍读,监管诸王室牒疏章奏等文书事务,这些官职都是由大儒或是精通儒学的人来充任的。后由于“求宰县不遂”^[1],加之在官场上受排挤,才学难以发挥,才开始专心修道。北方天师道寇谦之也出身门阀士族。自称东汉寇恂十三世孙,其兄寇赞为南雍州刺史。两汉以儒术治国,国家大力起用儒生,世代为官的家族也都是推崇和信奉儒学的世家。

道教金丹派奠基人葛洪自叙其家世时,称其祖

收稿日期 2010-07-09

作者简介 焦兴青(1963-),女,甘肃民勤人,副教授,研究方向:历史、德育、教育管理。

父葛奚在吴国“历宰海盐、临安、山阴三县，入为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庐陵太守、吏部尚书、太子少傅、中书、大鸿胪、侍中、光禄勳、辅吴将军、封吴寿县侯”^[2]，称其父葛梯“以孝友闻，行为士表，方册所载，罔不穷览。仕吴五官郎、中正、建城、南昌二县令，中书郎、廷尉平、中护军，拜会稽太守”^[2]。葛洪站在士族的立场上对其祖父、父亲两代的仕宦功名详加叙述，其语气中充满了以士族为荣的优越感，完全是以儒家孝道纲常的观点来表述的。以儒者的心态和观点来回忆其家世、看待社会问题及对待人生，是与其“年十六，始读《孝经》、《论语》、《诗》、《易》”^[2]并“写书诵习，以儒学知名”^[3]的学习儒家经典的背景息息相关的。

诸如葛洪、陆修静、陶弘景和寇谦之等著名的道教代表人物，他们都有儒学世家背景、早期学习儒家著作和仕宦的经历，他们也正是在这种儒学背景的影响下阐发道教思想、理论，从儒家汲取营养的，可以说他们的经历都是由儒入道。

2 积极入世的儒者心态

儒家是强调“入世”的，而道教则侧重于“归隐”、“升仙”。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日益发展完善的过程中，其所提倡的“归隐”、“修炼”以求“升仙”而长生不死的“避世”思想，是在这些道教代表人物积极追求“入世”而不得的前提下所提出的。

素怀“隐逸”之志的葛洪，曾在东晋供职近14年之久，在其屡次入仕失败后，才开始著述修道。南北朝道教著名人物陶弘景也是在官场不得意的情况下入道的。陶弘景经历了刘宋与萧齐的政权更替，由于与刘宋政权的密切关系，决定了他在萧齐政权中不被重用的仕途。他在修隐前致其堂兄的信中叹：“畴昔之意，不愿处人间，年登四十，志毕山藪。今三十六矣，时不我借，几知其神乎？毋为自苦。”^[4]在如此不得意，却又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才入道修隐，然而其积极“入世”的态度却没有变。在萧衍即将称帝立国之际，“弘景援引图签，数处皆成‘梁’字，令弟子进之”。^[5]由于其积极支持梁武帝，又对梁武帝建国有功，而后“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咨询。月中常有数信，时人谓山中宰相。”^[1]

北方天师道的代表人物寇谦之，其在北魏政治

中所发挥的作用与“山中宰相”陶弘景相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道教关键人物积极地参与世事政治，才使得道教能够在此时迅速发展起来。随着道教的不断壮大，在社会上作用的日益显著，这些道教人物也越来越受到统治阶层的重视，他们的社会地位也日益提升，他们原已没落的士家地位借道教的兴起，而又重新崛起。

3 儒家纲常伦理的再现

道教虽然具有积极“入世”的一面，但如果没有治世功用的话，也是不可能受统治者重视，不可能迅速发展起来。道教除了具有麻痹贫苦民众的作用外，同时还具有宣扬封建等级思想，维护封建礼仪制度的作用，这种作用正是道教授引儒家纲常伦理才发挥出来的。

葛洪在《抱朴子内篇·对俗》中说：“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2]葛洪把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吸收过来，并纳入自己的体系当中。该时期道教正是按照葛洪所提出的把倡导儒家的纲常伦理融入道教思想理论中来的思路逐步发展的。陆修静在改革江南道教中完善受箓制度时，就把封建地主等级制度及儒家纲常伦理融入了其中。《陆先生道门科略》中规定：“民有三勤为一功，三功为一德。民有三德，则与凡异，听得署箓。受箓之后，须有功更迁，从十将军箓阶至百五十。若箓吏中有忠良质朴，小心畏慎，好道翹勤，温故知新，堪任宣化，可署散道士。若散气中有清修者，可迁别治任职。若别治中复有精笃者，可迁署游治任职……。”^[6]这样不但完善了组织制度，同时制定了每一级别箓的标准，使天师道的制度更为完备了。而把授箓和箓级的更换与道徒的功德联系起来，便是把封建制度宗教化了的最好例证。

寇谦之在《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说：“诸欲奉道不可不勤，事师不可不敬，事亲不可不孝，事君不可不忠。”^[7]还劝导信徒：“臣忠子孝夫信妇贞兄敬弟顺，内无二心，便可为善得种民矣。”^[7]这与儒家的纲常伦理基本无二。寓儒家的纲常伦理于道教的理论体系之中，不但使原始道教作为反映下层群众疾苦和呼声的旗帜作用顿然而失，而且成为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绝好工具。

4 崇道贵儒

由于深受儒家思想影响,这些道教代表人物对儒家思想极为推崇。陶弘景在《真灵位业图》中把天神、地祇、人鬼及诸仙真列为7个等级,把儒家的代表孔丘、颜回排在第3级左位,说明了其在尊崇道教的同时,对儒家也是十分崇敬的。寇谦之这样体会儒教的重要性,“吾行道隐居,不营世务,忽受神中之诀,当兼修儒教,辅助泰平真君,继千载之绝统。而学不稽古,临事暗昧。卿为吾撰列王者治典,并论其大要”^[8]。他深刻地认识到如果不从儒家中吸取治国安邦的理论,单靠道教是无法实现的,只有“儒道兼修”才能把道教不断发扬光大,实现治国安邦的理想。

对于儒道兼修、崇道贵儒及对儒家的推崇等方面,葛洪的思想最具代表性。他在论述儒、道的关系时说:“道者,万殊之源也;儒者,大淳之流也。”^[2]“万殊之源”、“大淳之流”正是儒道两者相辅相成关系的最好体现。对于儒道两者的先后,他明确认为:“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2]虽然他把道教看作是最完美的,但又从儒家与道教的关系上论述了儒家不可或缺的重要性,“所以贵儒者,以其移风易俗,不惟揖让与盘旋也。所以尊道者,以其不言而化行,非独养生之一事也”^[2]。面对魏晋以来儒家纲常伦理崩坏的情况,葛洪感叹到:“世道多难,儒教沦丧。”^[2]所以他认为“宗室公族及贵门富年,必当竞尚儒术,撙节艺文,释老庄之不急,精六经之正道也”^[2]。可以看出他对儒家非常推崇,在世道沦坏之

际,对儒家的需要甚至急于释和老庄。

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所表现出来的这些儒家特色,归根结底是由这些道教领袖人物决定的,现世功利和事业成就感使他们在儒与道之间寻求平衡。正如陈昌文先生分析的那样,“儒之名义原来是得之文饰,道之隐逸原来是失之补偿”^[9]。这些道教人物提倡儒道兼修、引儒入道,使得道教在该时期不断地向官方化发展,成为统治者的工具,在统治阶级的推崇和支持下,道教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参考文献:

- [1] 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2] 葛洪.抱朴子内外篇[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3] 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4] 李昉.文苑英华[M].北京:中华书局,1982.4605
- [5] 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 [6] 陆修静.陆先生道门科略[A].道藏(第二十四册)[C].天津、上海、北京:天津古籍、上海书店、文物出版社,1988.781
- [7] 寇谦之.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A].道藏(第十八册)[C].天津、上海、北京:天津古籍、上海书店、文物出版社,1988.232-237
- [8] 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9] 陈昌文.葛洪一由儒向道的心里历程[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4)